

家庭能动主义:农村新三代家庭的结构韧性及动力机制

李永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家庭再生产逐渐卷入现代化进程,在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糅合下,中国农村家庭变迁路径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虽然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之间的独立性增加,家庭结构在形式上具有核心化的趋势,但是面对现代性压力,代际之间依然存在着广泛且灵活的合作模式,形成了新三代家庭的结构形态。新三代家庭是父代支持子代家庭的模式,家庭资源约束条件决定了父代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故新三代家庭可区分为“半工半耕”家庭和“老漂”家庭两种形态。新三代家庭结构突破了家庭现代化理论隐含的线性变迁路径,其“虚分实合”的结构特征赋予代际整合一定的弹性,这不同于传统三代家庭。后者是一个基于伦理统合的有机整体,代际整合具有比较显著的伦理刚性。根本而言,新三代家庭产生于农民家庭对现代性压力能动性调适的过程中,是家庭能动主义的实践表达。家庭目标定义了农民家庭能动性调适的方向,而家庭资源决定了农民家庭能动性调适的空间,外部的压力由此转化为新三代家庭再生产的动力。家庭能动主义为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性质提供了重要视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家庭能动主义;城乡中国;家庭结构;家庭目标;家庭资源

中图分类号:C 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25)01-0017-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增加,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家庭的变迁。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倾向于以家庭现代化理论解释中国家庭变迁,强调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核心化趋势。但如果深入研究变迁中的家庭形态,则会发现中国家庭转型具有复杂性,不能被简单纳入家庭现代化的线性解释框架。农民家庭结构虽然在形式上趋于小型化、核心化,却依然在代际之间具有较大的凝聚力,代际之间紧密结合形成的新三代家庭^①正是家庭变迁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基于此,本研究将在城乡中国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农村新三

代家庭形态的分析,揭示家庭能动性适应和创造性转化的实践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家庭结构的弹性。研究转型期的农村家庭形态不仅有助于深化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认识,而且对于转型期家庭政策的定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一)现代化理论视阈下的家庭结构核心化

发端于西方社会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是阐释家庭转型的主流理论视角,这一视角深刻影响了学界

收稿日期:2024-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21CSH030)

作者简介:李永萍,社会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家庭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研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关于中国家庭转型的研究。古德认为,传统的扩大家庭制度阻碍了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以“夫妇式家庭”为代表的核心家庭更有利于推动工业化^[1]。总体而言,家庭现代化理论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夫妇式家庭制度间的适应性,以及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的适应性,视家庭变迁过程为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关系离散化、家庭功能简单化的过程,并预设了现代家庭比传统家庭更为先进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观点。

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呈现出核心化的趋势,核心家庭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主导形态。王跃生从变迁的视角分析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历程,指出“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多数农村的核心化已经实现”^[2]。转型期的家庭结构呈现出结构简化和规模小型化的特点^[3]。张翼从空巢家庭切入,认为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与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中国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而家庭结构则进一步呈现出核心化趋势^[4]。贺雪峰认为,作为中国家庭结构核心的父子轴关系已经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其基本逻辑是由父子之间的对称责任到父子不对称责任、再到父子之间对称责任的变化。经由不对称责任而来的新的对称责任与之前的父子对称责任已经有了根本性不同^[5]。刘燕舞从离婚现象切入,认为离婚现象增多的原因在于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开始为个体本位的观念所取代,加速了农村夫妻关系的解体^[6]。

总之,家庭现代化的理论观点认为家庭结构核心化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7],强调家庭结构变迁的离散化趋势。在工业化进程中,家庭的要素在市场、产业的逻辑下重组,家庭成员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实现经济自主是家庭结构核心化的重要原因^[8]。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打工经济带来的家庭成员空间分离等因素也构成家庭结构转变的宏观背景^[9]。家庭核心化不仅带来家庭结构简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而且推动了私人生活的兴起,家庭结构变迁呼应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10]。

(二)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经验悖论

家庭现代化理论为理解中国家庭转型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视角,然而,其缺陷在于预设了家庭转型的单一路径和线性路径,进而忽视了中国家庭转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为此,须扩展家庭变迁研究的理论视角,立足转型期中国家庭的经验形态,揭示中国家庭变迁的复杂逻辑。近年来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在家庭结构核心化之外还存在着家庭结构扩大化的趋势,这与家庭现代化理论设定的家庭结构变迁路径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偏差,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因而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经验悖论。家庭结构变迁的经验悖论展现了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多元图景,这意味着不能仅仅将家庭视为被动承受现代性力量的客体,也不能将现代化仅仅视为侵蚀家庭结构的力量。从家庭变迁的经验悖论中发掘中国家庭的能动性,才能真正扩展家庭变迁的研究视野。

王跃生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在 1990 年之前呈“核心化”趋势发展,而 1990 年之后农村核心家庭比例下降、三代直系家庭比例上升^[11]。王跃生进而提出了“直系组家庭”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当代家庭形态的特点^[12]。黄宗智认为,中国在转型期所形成的“半工半耕”的农业经济结构和大量非正规经济群体的存在,决定了中国农村的家庭不可能走向绝对的核心化,“三代家庭”在转型期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13]。彭希哲和胡湛认为,当代中国家庭具有“形式核心化”和“功能网络化”的特点^[14],代际整合成为家庭应对现代化压力的重要方式。基于此,有学者将转型期的中国家庭结构概括为“新三代家庭”^[15],并指出这种家庭结构具有与传统直系家庭完全不同的特征,是农民家庭在现代化压力之下的功能性调适^[16],体现了转型期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与韧性。

中国家庭结构扩大化的经验现实表明,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和适应性^[17]。中国家庭变迁过程中的经验悖论意味着,研究当下中国家庭形态不宜局限在家庭结构的形式层面,而应深入转型家庭的运行逻辑,才能破解家庭变迁的经验悖论。实际上,上述关于家庭结构扩大化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家庭关系的实践形态层次理解家庭结构形态,从而将家庭结构视为在家庭关系实践中持续生成的产物。代际关系是透视家庭结构变迁的重要切口,

由于中国家庭承载着农民世系绵延的价值依托,代际之间的结合具有强大的伦理韧性,为三代直系家庭形式的延续奠定了基础。所以,三代直系家庭构成了学界反思中国家庭转型模式的焦点,而三代直系家庭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中国家庭转型的走向。

既有关于中国家庭转型经验悖论的研究呈现了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非线性特征,但对于转型期农民家庭形态生成的动力机制还缺乏充分的研究。其结果是,要么将转型期的三代家庭形态视为传统大家庭伦理的延续,要么将其视为代际之间的一种权宜性策略,这都无法在根本上说明这种三代家庭的独特性及其对于理解中国家庭变迁的意义。在城乡中国背景下,城乡之间的紧密互动促进了传统与现代的糅合,传统的家庭伦理和个体化的理性意识共同塑造了富有能动性的家庭动力机制。因此,本文将从家庭能动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城乡中国背景下新三代家庭结构的基本形态及其形成的动力机制,进而揭示转型期农民家庭的能动性适应与创造性转化的实践逻辑。

二、家庭结构变迁背景: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家庭有着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运动推动了家庭的民主革命,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进程则引发了农民家庭的基础结构之变^[18],市场化以无声、隐秘而又难以阻挡的力量,不仅迅速改变了传统的乡土社会和乡村社会性质,而且推动了农民家庭更为深刻的转型与变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中国逐渐由传统的“乡土中国”迈向“城乡中国”^[19]。“城乡中国”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形态转型的重要范式,也是影响农民家庭转型的重要时代背景。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括为“乡土中国”^[20],这构成社会学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经典认识。梁漱溟从文化角度指出乡土中国是“伦理本位”^[21]的社会。传统的乡土中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封闭性和静态性。乡土中国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缺乏发展工业

的基础,农民无法从农业之外获取其余收入来源,因此只能不断加大农业劳动投入,进而导致小农经济“内卷化”和“过密化”的状态^[22]。在相对静止和封闭的乡土中国,乡村与城市是两套相对独立的生活系统,村庄构成农民主要的生活场域。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完全的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相互信任度很高,农民对村庄生活有预期、有归属感。同时,稳定的乡土社会使得农民家庭与村庄社会深度互嵌,农民家庭再生产与村庄秩序再生产是高度统一的过程。因此,在乡土中国的背景下,农民的生活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是有预期的,农民家庭再生产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自然展开,农民家庭结构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静止和封闭的乡土社会逐渐被打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渐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农民周期性地往返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候鸟式的迁徙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特色模式。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渐开放和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原本独立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高^[23],城乡互动增多,中国逐渐进入城乡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在城乡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农村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生活系统,农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家庭目标、家庭策略等都受到城市社会的影响;同时,城市也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生活系统,城市各行各业的运转都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的参与。城乡中国奠基于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上,这为农民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自由进出和自由转换奠定了重要基础^[24]。可见,农民家庭再生产不再局限于村庄社会场域,而是受到现代化和城市化等要素的影响,并深深地嵌入城市体系。农民家庭再生产从传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转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导致家庭再生产的目标转变和压力增大,进而引发家庭结构的调适。

三、新三代家庭结构的基本形态

在城乡中国背景下,农民的流动性增强,城乡关联更为密切。农民的城乡流动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农民家庭结构形态不仅受到家

庭所处生命周期的影响,而且还要适应城乡中国的基本特点。家庭成员的空间分离在一定程度上显化了家庭核心化的趋势,然而,如果深入转型期农民家庭的日常生活实践,可以发现农民家庭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核心化的特点,但在实质上却越来越强调代际之间的“合”。在现代性压力之下,农民家庭对代际整合的需求很强,因此家庭结构在实质上具有扩大化的趋势,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上升。在这一部分,笔者将聚焦家庭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三代家庭”,分析其在“虚分实合”的形态下蕴含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这是农民家庭能动性适应的基础。新三代家庭主要是在家庭发展目标下父代支持子代的模式,根据父代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可区分新三代家庭的两种典型模式,即“半工半耕”家庭和“老漂”家庭。前者是父代依托村庄支持子代,后者则是父代进城支持子代^②。

(一)“半工半耕”家庭结构形态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③,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大多数农民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具体来看,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形态在实践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亚类型:第一种是典型的半工半耕模式,即年轻夫妻在大城市务工,中老年夫妻在村务农和照顾孙代;第二种是代际之间的半工半耕分工与父代家庭的夫妻性别分工并存,即年轻夫妻在大城市务工,中老年夫妻中的一方(一般是奶奶)在乡镇或县城“陪读”,另一方则在村务农。

案例1:湖北应城P村的CFH,男,63岁。儿子2010年结婚,有一个小孩,12岁。CFH的家庭分工如下:他与妻子在村务农,种20多亩田,同时承担抚育孙子的任务(孙子从2岁开始就一直由爷爷奶奶带在身边),此外,CFH在冬季农闲时还会去武汉打工;儿子和儿媳在武汉打工,一般只在过年过节时回家。(20220819访谈资料)

案例2:湖北巴东赵村的YKF,女,66岁,在乡镇租房陪孙子上学。其家庭分工如下:儿子和儿媳在广东打工,儿媳进厂,儿子在

建筑工地,每年春节回乡;YKF主要负责在乡镇陪读,从孙子三年级开始;YKF的丈夫主要在村种地,偶尔在乡镇打一点零工。(20190911访谈资料)

案例1和案例2分别展现了上述两种“半工半耕”亚类型的基本形态。以上两种类型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孙代教育环境的差异,即孙代是在村里上学,还是到乡镇或县城上学。出现上述第二种家庭分工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由于“撤村并校”导致一些地区学生只能到乡镇或县城上学。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农村,由于交通不便,很多农民家庭都不得不腾出一个劳动力到乡镇“陪读”,在年轻人普遍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奶奶进城陪读成为大部分农民家庭的首选。二是由于年轻父母越来越重视小孩教育,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年轻人倾向于让子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部分家庭让祖代到县城或市里陪读。

总体来看,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形态具有以下4个特征:第一,家庭分工以代际分工为主,打破了传统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年轻的子代外出务工,中老年父代在村务农和照顾孙代,代际之间“工”与“耕”的分工可以实现家庭劳动力的充分配置,这种家庭分工模式有利于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最大化。这是因为,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主要还是非正规就业,这些工作对体力要求普遍较高,因此中青年人在就业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中老年人进入市场的机会随着年龄的递增而逐渐递减。中老年人虽然在全国务工市场上不具有优势,但他们熟悉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种植环节,而且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普遍提高进一步降低了农业劳动的辛苦程度,这极大地延长了中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第二,家庭经济“虚分实合”。在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形态下,父代在村务农的收入基本可以维持祖孙两代人的日常生活开销,有时还能有部分结余;子代夫妻的打工收入除了在城市必要的生活开销之外,大部分可以积攒起来,用于家庭的大项开支,如小孩教育、买房等。中老年父代和年轻子代虽然在形式上是两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但是并没有完全分开,父代在有经济结余的情况下仍然会将资源转移给子代家庭。第三,家庭

成员的空间分离。祖代和孙代长期生活在一起,年轻的子代夫妻平常在大城市务工,一般只在每年春节才回家。因此,农民家庭普遍不分家,家庭结构由年轻夫妻组成的“流动家庭”^[26]和祖孙两代人组成的“留守家庭”构成。第四,家庭关系比较和谐,但代际之间的情感互动较少。由于父代和子代平常没有在一起生活,家庭成员的空间分离弱化了家庭矛盾产生的可能性,代际关系呈现出“温情脉脉”的特点。同时,由于中老年父代和子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较少,代际之间缺乏情感互动的机会和空间,因此两代人之间难以建立起亲密的情感关联。

(二)“老漂”家庭结构形态

在农民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出现了“老漂”群体,他们从农村暂时性和阶段性进入城市,帮助子代照顾小孩,以使子女有更多时间投入到自身职业发展之中^[27]。“老漂”群体以“单漂”为主,即大部分家庭都是由奶奶一个人进城照顾孙代,爷爷则留守农村。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中老年男性普遍不愿意跟着妻子一起进城,这是因为:第一,城市生活空间比较狭小且封闭,中老年男性与儿媳妇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有诸多不便;第二,中老年男性普遍不太会做家务,他们进城之后显得无所适从,感觉自己是一个“闲人”,不仅帮不上忙,还增加了子代家庭的负担;第三,中老年男性选择留守农村,不仅可以减少子代在城市的生活开支,还可以在农村务农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一般情况下,“老漂”群体至少要在城市将孙代带到上初中不需要接送上下学为止,因此他们的“老漂”生活大致要持续10年时间。

“老漂”家庭和“半工半耕”家庭都体现了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其差异在于,前者以父代阶段性进城为基础,后者以父代留守农村为基础。因此,“老漂”家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父代要进入城市帮助子代带小孩。根据父代进入城市的周期的不同,“老漂”家庭在实践中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父代以一学期或一年为周期进入城市当“老漂”,父代一般在孙代放寒暑假或者是过年时回村居住一段时间,等到孙代开学时再次进入城市,这种类型在中西部地区比较普遍,这也是当前“老漂”家庭的主导形态。第二种类型是父代以一周为单位进入城市

当“老漂”,即周一至周五在城市里帮助子代带小孩,每周末回村居住,这种类型在大城市郊区农村比较普遍。大城市郊区农村与市区之间的适度距离,为“老漂”群体以周为单位穿梭于城乡两个家庭提供了基本条件。

案例3:陕西眉县M村,RQ,63岁。儿子2020年结婚,2021年生育小孩。RQ家的分工如下:儿子和儿媳在西安有稳定工作;RQ的妻子从孙子出生后在西安带小孩,平常很少回村,通常是在过春节和小孩放寒暑假时回村一段时间;RQ在家务农,种植8亩猕猴桃。(20200718访谈资料)

案例4:北京郊区农村WMY,女,50多岁,有1个儿子。在父母的资助下,儿子在北京通州买了房子。WMY有一个孙子,四五岁。其家庭分工如下:儿子和儿媳在北京通州上班;WMY周一到周五在城里带孙子,每周末回村住两天;WMY的丈夫在村里种了几亩桃子。(20190818访谈资料)

案例3和案例4分别展现了“老漂”家庭的两种典型形态。总体来看,“老漂”的家庭结构形态具有如下4个特征:第一,家庭分工以代际分工为主,年轻的子代夫妻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中老年父代以照顾孙代和料理家务为主。“老漂”家庭的子代普遍是在城市里相对正规的单位就业,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固定,因此没有时间自己带小孩,需要父母进城协助。“老漂”家庭和“半工半耕”家庭里父代承担的主要任务有所不同,前者以抚育孙代为主要任务,后者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抚育孙代为辅。第二,在家庭经济上,“老漂”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子代夫妻的务工收入,父代主要是以家务劳动的方式给予子代家庭提供支持。部分家庭的父代有一些积蓄,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子女一些补贴,比如家庭日常的买菜费用和孙子女的零食费用是由父代负责。第三,家庭成员在空间上相对集中,祖孙三代人长期居住和生活在一起。但是,对于“单漂”家庭而言,中老年父代夫妻则可能面临阶段性分离的情况。第四,家庭关系和谐且亲密,但家庭摩擦也比较多。在“老漂”家庭中,中老年父代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到城市里帮助子代带小孩,缓

解了年轻子代的压力,这使得子代对父代普遍都比较感激,因此代际关系比较和谐。同时,由于两代人长期生活在一起,有情感互动的机会和空间,相互之间更为了解,因此代际关系还呈现出亲密的特点。然而,由于中老年父代和年轻子代的成长经历和认知方式的不同,两代人长期在一起生活也必然会产生很多摩擦,这些摩擦体现在消费观念、育儿方式、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虽然两代人之间的生活摩擦较少发展为激烈的家庭冲突,但也给家庭关系注入一丝紧张感。

(三)新三代家庭结构的弹性

以上从“半工半耕”和“老漂”两个角度描述了城乡中国时代农民家庭的主要形态。这两种家庭形态既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也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即都是农民家庭代际整合的重要方式。由于乡村社会无法为农民家庭再生产提供足够的资源,而现阶段城市又给农民家庭生活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因此,通过代际合作应对城乡中国的流动性及其蕴含的不确定性,是农民家庭的必然选择。在上述家庭结构中,父代、子代和孙代构成一个紧密的合作单元,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虽然具有形式上的独立性,但都致力于实现家庭发展的共同目标。因此,新三代家庭具有“虚分实合”的结构特征,这与传统的三代家庭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传统三代家庭是一个基于伦理统合的有机整体,代际之间的结合具有比较显著的伦理刚性。而“虚分实合”的特征意味着新三代家庭结构具有比较显著的弹性。父代和子代虽然合作,但这种合作指向的是特定的家庭目标,而不再依托结构一体化的方式实现。新三代家庭中的父代和子代两个核心家庭存在着显著的边界,但这个边界并不影响父代事实上对于子代家庭的支持。因此,家庭核心化不足以概括城乡中国时代的农民家庭形态。无论是立足乡村,抑或是立足城市,代际之间的实质性合作都是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普遍景象。当然,代际之间的合作形式并不遵循必然的结构规定。无论是“半工半耕”家庭,还是“老漂”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民家庭基于家庭再生产的现实需要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这种选择固然受制于家庭资源的约束,但是家庭再生

产的目标扩展本身也蕴含了家庭动员的潜能,从而释放了农民家庭的能动适应性,形成了代际之间灵活多样的分工形式与合作模式。

四、新三代家庭形成的动力机制

新三代家庭结构是农民能动性地回应和适应现代性压力的产物。现代性压力是农民家庭结构调适和配置的结构性约束。现代性压力在与农民生产生活的交互过程中具体化,主要体现为婚姻压力、进城压力和教育压力,婚姻、城市化和子女教育是现代性压力影响农民家庭的重要切点,并深刻地塑造了新三代家庭的动力机制,从而使新三代家庭结构得以在现代性压力的场景下不断再生产。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从家庭目标和家庭资源禀赋这两个因素分析家庭动力机制,其中,家庭目标定义了农民家庭能动性调适的方向,而家庭资源禀赋决定了农民家庭能动性调适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家庭目标和家庭资源禀赋共同定义了家庭能动主义的表达方式。

(一)家庭目标的引导

家庭目标是影响家庭策略,进而影响农民家庭结构配置的关键要素。农民的家庭目标在乡土中国和城乡中国时期具有本质不同。在传统乡土中国,农民家庭的主要目标是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具体包括结婚、生育、抚育子代、赡养老人等任务,这直接关系到农民生命价值能否实现。因此,在这种目标引导下的家庭动力具有一种深沉、平稳的状态,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实现家庭继替和绵延。这一时期的家庭目标稳定且可预期,伴随着结婚、生育、分家、死亡等生命历程,家庭生命周期依次要经历“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等6个阶段^[20],农民家庭结构一般也会依次经历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空巢家庭等几种类型。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家庭再生产的具体目标。

然而,在城乡中国背景下,农民的家庭目标不再是完全源于人生任务的内在规定,家庭目标突破了乡村社会的束缚,逐渐受到现代化和城市化力量

的影响。现代性进村打破了传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塑造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农民家庭不仅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而且还要追求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家庭的跨越式发展。总体来看,在城乡中国时期,农民家庭需要完成以下3个目标:一是抚育子代;二是支持子代结婚,包括支付婚姻成本;三是发展性目标,包括进城买房、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家庭目标的提升使农民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意味着单独依靠父代或子代的核心家庭往往难以完成家庭目标,因此,农民家庭越来越重视代际之间的合作,通过调整家庭结构和整合家庭资源,提升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能力,进而实现家庭发展与流动的目标。家庭目标的扩展和现代性压力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核心家庭结构的边界,农民家庭结构呈现出扩大化趋势。具体来看,基于家庭目标的转变,农民家庭结构调适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优化家庭分工结构,实现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最大化。一定的经济资源是实现家庭目标的前提,而家庭劳动力分工是否合理决定了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强弱。“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和“老漂”的家庭结构都是以代际分工为主,这种家庭分工方式能够实现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动员和整合,有利于家庭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年轻子代以在城市务工为主,中老年父代以务农和照料孙代为主,农民家庭劳动力获得充分释放,每个家庭成员都发挥了自己最大的能量,从而提高了家庭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能力。

第二,整合家庭资源,实现家庭资源配置最优化。能否将家庭资源有效整合与配置,决定了有限的家庭资源能否获得最大化使用,进而决定了家庭资源的使用效率。城乡中国背景下,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一般是两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但这并不代表家庭资源是分散使用。实际上,家庭资源是统筹在一起,且主要向子代家庭集聚,这使得农民家庭可以通过代际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家庭资源配置方面,由于农民家庭具有实现城市化等发展性目标,因此在保证基本的日常生活之外,家庭资源更多用于劳动力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孙代的教育尤其重视。

第三,改善孙代的教育环境,以教育促进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教育是实现家庭社会流动的重要方式,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倾向于将小孩送到城镇上学。上文中提到的“陪读”家庭和“老漂”家庭,实际上都是为了满足小孩教育的需要,经济条件比较普通的家庭往往采取“陪读”的方式,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则可以直接在城市买房,让小孩到城市上学。可见,城乡中国不同于乡土中国,农民家庭的运行轨道和运行逻辑发生了变化,家庭目标的层次和难度相应提升,这意味着家庭策略也需要做出新的调整,以适应家庭发展与流动的需要。

总之,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打破了传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开始兴起。农民家庭不仅要完成家庭继替和家庭延续的任务,而且还要实现家庭向上流动的目标。家庭目标的提升和实现难度的增加意味着必须要将家庭成员高度动员和整合起来,以实现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最大化,这是理解城乡中国背景下农民家庭结构整合的关键。

(二)家庭资源禀赋的驱动

城乡中国背景下,农民家庭发展目标主要聚焦于实现城市化,这要求突破农业社会的家计模式,通过家庭内部的充分动员从城市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资源。城市化的家庭目标相对于传统的人生任务而言在实现难度方面显著增加,这强化了代际之间的整合。不过也要看到,家庭内部的动员强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既定的资源禀赋,后者具体决定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方式和家庭成员分工模式。具体来看,家庭资源禀赋决定了农民家庭结构配置是以农村为主还是以城市为主。

第一,当家庭资源禀赋有限时,家庭结构配置是以农村为主。上文述及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形态就是典型。这种家庭结构形态在形式上表现为“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的组合,“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虽然面临城乡空间分离的问题,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割裂,而是存在紧密的功能性关联。在这种家庭结构配置中,由祖代和孙代组成的“留守家庭”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是家庭资源的聚集地,

同时也是家庭成员价值感和归属感的源泉。由年轻夫妻组成的“流动家庭”是从“留守家庭”派生出来的,年轻夫妻通过将个体劳动力市场化,尽可能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更多经济资源。由于家庭资源的有限性,这种类型的家庭在当前还不具备在城市买房和体面安居的经济能力,因此,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城市在当前阶段主要是进行资源积累的地方,以满足其家庭的生产功能,而农村熟人社会才是生活的地方。

第二,当家庭资源禀赋较强时,家庭结构配置是以城市为主。上文述及的“老漂”家庭就是典型。由于家庭的资源禀赋较强,通过父代和子代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子代的城市化,由年轻子代和孙代组成的核心小家庭长期生活在城市,中老年父代作为辅助性力量阶段性进城帮助子代带小孩。在这种家庭结构配置中,由年轻子代和孙代组成的在城市的核心小家庭是整个家庭的核心,家庭内部所有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都聚集到城市小家庭,以实现子代家庭在城市的立足和发展。

由此可见,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凸显了家庭资源约束条件对于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资源条件决定了家庭如何回应现代化压力并实现家庭发展目标。虽然农民家庭资源条件存在差异,但面对外部压力而产生的能动适应则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和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转型期的农民家庭结构形态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当家庭资源越来越丰裕时,以农村为主的家庭结构形态也会逐渐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家庭结构形态。

五、结论与讨论

家庭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融合了家庭目标的引导与家庭资源的限定。家庭目标通过与人生任务衔接而展现出较大的动员性,并基于家庭资源约束条件的不同呈现出灵活多样的新三代家庭结构形态。家庭结构是家庭转型的最直接表征,常常被学者们作为理解家庭转型的重要切口。然而,对于家庭结构的理解和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家庭规模(家庭人口数量)和家庭边界(是否分家)等外在表征,也不能仅仅基于代际之间表面上的“分”

与“合”,还要进入到农民家庭的生活实践,分析农民家庭在实践中是如何超越“分”与“合”的界限、在代际之间形成“有分有合”和“虚分实合”的状态。这实际上凸显了家庭能动主义视角的重要性。

实际上,无论是“半工半耕”家庭,还是“老漂”家庭,都反映了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具有很强的抗逆力。家庭结构突破了家庭生命周期的规定,农民家庭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对家庭结构进行积极的调适,以应对家庭发展过程中的困境。据此,新三代家庭结构实际上是家庭能动主义的实践表达。在本文中,家庭能动主义是基于“家庭主义”这一概念的拓展和延伸。“家庭主义”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基本精神,从而形成与个体主义的路径分殊^[29]。需要注意的是,家庭主义不仅是一种权宜策略,还是中国家庭的伦理特质。一些研究者以“下行式家庭主义”^[30]、“新家庭主义”^[31]、“双系家庭主义”^[32]等说法来概括当下家庭主义的适应形态,强调了中国家庭制度的伦理韧性。在这些研究中,“家庭主义”的延续主要是家庭成员个体策略行为的产物,而“家庭主义”作为一种伦理特质依然处于某种程度的衰减过程。本文提出“家庭能动主义”这一概念旨在说明,在日益开放的乡村社会中,家庭的能动性不仅是传统家庭伦理韧性的体现,而且是现代性压力激发的家庭结构调适,充分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家庭能动主义植根于转型期家庭变迁的广泛经验基础,它承认家庭现代化转型路径的开放性,即不再将转型家庭视为现代性力量直接塑造的产物,而是注意到家庭的内部动员空间和内在适应能力。因此,家庭能动主义是全面把握转型家庭的重要视角,它有助于呈现家庭形态的多样性和家庭转型过程的复杂性,进而破解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悖论形态。作为一种研究视野,家庭能动主义启发了本文关于新三代家庭结构的分析,展现了对于中国家庭制度的重要认识论意义。尤其是面对家庭现代化理论范式存在的线性进程与历史断裂,家庭能动主义提供了理解家庭变迁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重要视角。此外,家庭能动主义的视角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实践意涵。由于既有的家庭现代化研究范式侧重于从应然的角度强调家庭变迁中的个体化和原子化,导致家庭政策过于偏重个体,而相对

忽视了以家庭作为政策承接主体的可能性。面对城乡中国时代新三代家庭结构呈现出来的家庭变迁图景,家庭政策思维也须纳入家庭能动主义的视角,通过激活和引导家庭的能动性,推动中国农村家庭稳健有序的转型。

转型期的新三代家庭结构在给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发展可能性的同时,也给农民家庭带来诸多隐忧,农民家庭也必然要承受其代价。其中,老年人是代价的主要承受者。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当前农村社会中“四代同堂”的家庭非常普遍,而最年长一代的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的退化和劳动能力的弱化难以对家庭积累做贡献。农民家庭为了最大程度地积累资源,通常会弱化对家庭中高龄老年人的资源反馈和日常照料。面对农民家庭转型过程中压力与风险配置的不均衡问题,国家有必要强化对于农民家庭的政策支持,提高农民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最后,本文关于家庭能动主义的分析也还存在不足。本文虽然强调了新三代家庭不同于传统家庭伦理整合的一面,但是,关于家庭能动适应的探讨基础尚未跳出伦理的范式。随着家庭转型,家庭作为私人生活单位的色彩愈益凸显,所以,关于转型期家庭动力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还应更多地纳入情感的维度,并建立情感与伦理融合分析的框架,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于家庭能动主义的理解,这是后续研究应当着力推进的方向。

注:

- ① 为了区别于传统三代家庭,本文将转型期农村三代直系家庭称之为“新三代家庭”。
- ② 由于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渐进性以及中国各地农村资源条件和发展禀赋的差异,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并呈现为非常多样的类型。囿于论文的篇幅,本文无法对新三代家庭的所有具体形态展开讨论,故此处讨论的两种形态并未穷尽新三代家庭的类型,而是主要依据父代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进行分类。因此,本文讨论的两种类型属于新三代家庭的两种最典型的形态,其中隐含的一个前提是将子代家庭视为城市化进程中同进退的整体,未考虑子代家庭夫妻在城乡之间的分工。事实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展开和农民家庭目标的扩展,在一些地方,农民家庭的代际合作呈现出了更复杂灵活的形式。笔者在近几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为了适应教育城镇化的形势,

子代家庭可能采取母亲返回县乡陪读的形式,这在事实上形成父代家庭在村、子代家庭丈夫在外务工和妻子在县乡陪读的空间格局。这方面的研究可进一步参考李永萍,“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6): 75-84.

参考文献:

- [1] (美)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246-248.
- [2] 王跃生.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5):36-48.
- [3] 曾毅,李伟,梁志武.中国家庭结构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J].中国人口科学,1992,(2):1-12.
- [4] 张翼.中国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与老年空巢化[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6):87-94.
- [5] 贺雪峰.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辽宁大古村调查[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6):41-46.
- [6] 刘燕舞.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关于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9,(6):42-46.
- [7]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0,(3):199-222.
- [8] 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1-5.
- [9] 杨菊华,何绍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研究,2014,(2):36-51.
- [10] (美)阎云翔.私人生活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04-208.
- [11] 王跃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9,(4):95-104.
- [12] 王跃生.直系组家庭:当代家庭形态和代际关系分析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07-132.
- [13] 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1,(5):82-105.
- [14]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5,(12):113-132.
- [15] 张雪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20-126.
- [16]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4-60.
- [17] 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3):26-53.

- [18]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江海学刊,2008,(4):108-113.
- [19]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10):128-146.
- [20]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61.
- [2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5.
- [22]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12.
- [23] 朱战辉.城乡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结构与秩序[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32-140.
- [24] 林辉煌,贺雪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10.
- [25] 贺雪峰.三大全国性市场与乡村秩序[J].贵州社会科学,2019,(11):38-43.
- [26] 姚俊.“不分家现象”:农村流动家庭的分家实践与家庭再生产——基于结构二重性的分析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3,(5):78-94.
- [27] 何惠亭.代际关系视角下老漂族的城市适应研究[J].前沿,2014,(17):157-161.
- [28] 曾毅.一门十分活跃的人口学分支学科——家庭人口学[J].中国人口科学,1988,(6):58-63.
- [29] 孙向晨.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再反思[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62-69.
- [30] 阎云翔.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探索与争鸣,2017,(7):4-15.
- [31] 康岚.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J].青年研究,2012,(3):21-29.
- [32] 沈毅,周雅静.双系家庭主义、代际关系嵌入与第三代姓氏选择——基于南通地区二孩姓氏“一边一个”“并家婚”案例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4):66-74.

【责任编辑:周濛】

Family Activism: The Structural Resilience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New Three Generations of Rural Families

LI Yong-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production of peasant families has gradually been involve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orces, the change path of Chinese rural families has shown greater complexity. Although the independence between the parent family and the child family has increased, and the family structure has a trend of core in form, in the face of the pressure of modernity, there are still extensive and flexible cooperation mode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form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new three-generation family. The new three-generation family is a model in which the father supports the son's family. The constraints of family resources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he father gener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 that the new three-generation famil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forms: the "half-working and half-farming" family and the "old drifting" family. The structure of the new three-generation family breaks through the linear transition path implied by the theory of family modernization, and it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division and real integration" give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certain flexibil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hree-generation family, which is an organic whole based on ethical integration and has significant ethical rigidity.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e new three generations of families emerged from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peasant families to the pressure of modernity, which is the practical expression of family activism. Among them, the family goal defines the direction of the peasant family's initiative adjustment, while the family resources determine the space of the peasant family's initiative adjustment, and the external pressure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new three generations of family reproduction. Family activism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peasant familie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family activism; urban and rural China;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goals; household resources